

《洛阳名园记》

5 古典园林的唐宋变革

■ 林 嵩

摘要:北宋洛阳园林不再单纯追求“宏大壮丽”,转而欣赏“精微工致”的艺术境界,且善于调和“人力与自然”、“城市与山林”、“空间与时间”等不同矛盾,体现了中晚唐之后园林艺术转向内在与精微的趋势。

关键词:洛阳名园记 李格非 园林 壶中天地

DOI:10.16093/j.cnki.ccc.2017.02.017

—

北宋时,“洛阳名公卿园林,为天下第一”^①。李格非的《洛阳名园记》以细腻的笔触列述了当时洛阳名宦巨富之家的十馀处宅园。南宋的邵博“读之至流涕”,赞许李格非“出东坡之门,其文亦可观”,并将其全文抄录于《邵氏闻见后录》中,又写了很长的跋语:

予昔游长安,遇晁以道赴守成州,同至唐大明宫,登含元殿故基。盖龙首山之东麓,高于平地四十馀尺,南向五门,中曰丹凤门,正面南山,气势若相高下,遗址屹然可辨。自殿至门,南北四百馀步,东西五百步,为大庭,殿后弥望尽耕为田。太液池遗迹尚数十顷,其中亦耕矣。明日,追随以道入咸阳,至汉未央、建章宫故基,计其繁夥宏廓,过大明远甚,其兼制夷夏,非壮丽无以重威,可信也。又明日,至秦阿房宫一殿基,东西五百步,南北五十丈,所谓上可坐万人,下可建五丈旗,周驰为阁道,直抵南

山表,山之颠为阙者,视未央、建章,又不足道^②。

在北宋人的眼里,唐以前的宫苑,不论在规模或气象上,都远超当朝。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曾提出“唐宋变革”的论断。他说:“唐代和宋代,在各方面的文化生活上都有变化。除此之外,如果从一些细微的个人生活去观察,还可以发现更多这个时代的变化。”^③邵博所谈的,实为宫苑建筑方面的“唐宋变革”。

内藤湖南认为,“唐宋变革”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重要表现就是新儒学的确立。理学家是如何看待唐宋宫苑在规模上的巨大反差呢?与邵博同行的晁说之叹息:

《诗》所谓“经始勿亟,庶民子来”者,其专以简易俭约为德,初不言形胜富强,益知仁义之尊,道德之贵。彼阻固雄豪,皆生于不足,秦、汉、唐之迹,更可羞矣。^④

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里说:文王修造灵台,开

作者简介:林嵩,文学博士,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、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。

① [宋]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,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四,中华书局,1983年,页191。

②④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202。

③ 内藤湖南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》,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,中华书局,1992年,册1/页17—18。

始的时候并不急于完工,但百姓爱戴文王如子爱父,纷纷来前来帮助,于是很快造好了灵台^①。晁说之认为:帝王宫苑就应当以灵台为榜样,不要因过度奢华而劳民伤财,要以简朴为美。

显然,晁说之与邵博更多地是从道德方面来看待唐宋宫苑从“形胜富强”到“简易俭约”的变化。这一方面是溢美本朝,另一方面也是有为而发。北宋徽宗时,为了营造皇家园林艮岳,从宣和五年(1124)开始,命朱勔从南方征取太湖石与奇花异木,名为“花石纲”。巨舟装载着高广数丈的湖石,沿运河送抵开封。一路之上,凿河断桥,毁堰拆闸,历时数月,动用了数以千计的民夫。“花石纲”不仅在南方激起了方腊起义,而且耗损了北宋的国力与民力,成为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^②。晁说之与邵博都是亲见北宋灭亡的人,对此深有体会。因此南宋人总结:“宫室,汴宋之制,侈而不可以训。中兴,服御惟务简省,宫殿尤朴。”^③南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,虽然依旧挥金如土地营造宫室、园林,但至少在道德观念与官方话语的层面上,是提倡节俭、朴素的^④。

即使是艮岳,尽管铺张而奢华,但其气势已难望汉唐帝王宫苑之项背,其总体风格也与传统的皇家园林有别。这首先是因为北宋都城开封的整体地理环境缺乏长安城“骹函在左,泰华在前”的形胜条件。对于地形上的这一劣势,宋徽宗在《艮岳记》中依然以“在德不在险”的说法

作了解释:

昔我艺祖,拨乱造邦,削平五季。方是时,周京市邑,千门万肆不改,弃之而弗顾。汉室提封五方,阻山浮渭,屹然尚在也,舍之而弗都。于胥斯原,在浚之郊,通达大川,平皋千里,此维与宅。故今都邑广野平陆,当八达之冲,无崇山峻岭襟带于左右,又无洪流巨浸,浩荡汹涌,经纬于四疆。因旧贯之居,不以褻险为屏。且使后世子孙世世修德,为万世不拔之基,垂二百年于兹。祖功宗德,民心固于泰、华,社稷流长过于三江、五湖之远,足以跨周轶汉,盖所恃者德,而非险也。^⑤

其次是艮岳的设计理念已不再单纯追求“高亭大榭”,而是欣赏“壶中天地”的艺术境界。“壶中天地”的典故出自《后汉书·费长房传》:

费长房者,汝南人也。曾为市掾。市中有老翁卖药,悬一壶于肆头,及市罢,辄跳入壶中。市人莫之见,唯长房于楼上睹之,异焉,因往再拜奉酒脯。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,谓之曰:“子明日可更来。”长房旦日复诣翁,翁乃与俱入壶中。唯见玉堂严丽,旨酒甘肴盈衍其中,共饮毕而出。^⑥

“壶中天地”特别强调要和嘈杂的外部环境

① 《毛诗正义》卷十六之五,《十三经注疏》,中华书局,1980年,上册/页525。

② 详《宋史》卷八五《地理志一》,中华书局,1977年,册7/页2102;《东都事略》卷一〇六《朱勔传》,《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册40/页34—37。

③ 《宋史》卷一五四《舆服制》,册11/页3598。

④ 清高宗弘历《圆明园后记》称:“昔我皇考,因皇祖之赐园,修而葺之,略具朝署之规,以乘时行令,布政亲贤。而轩榭亭榭,凸山凹池之纷列于后者,不尚其华尚其朴,不称其富称其幽。”又说:“(圆明园)不斫不雕,一皇祖淳朴之心,然规模之宏敞,邱壑之幽深,风土草木之清佳,高楼邃室之具备,亦可称观止。实天宝地灵之区,帝王豫游之地,无以逾此。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,以创建苑囿,斯则深契朕法皇考勤俭之心以为心矣。”(《日下旧闻考》卷八〇《国朝苑囿》,册4/页1323—1324。)乾隆虽然一再标榜“淳朴”,并表示不再耗费民力修建园林,但在已有圆明园之后,还是以“治水”、“为母延寿”等名义,修建了清漪园(颐和园的前身),并声称自己从不在园中过夜:“园虽成,过辰而往,逮午而返,未尝度宵,犹初志也,或亦有以谅予矣。”(《日下旧闻考》卷八四《国朝苑囿》,册5/页1392—1393。)

⑤ [宋]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卷二,《挥麈录》,上海书店,2009年,页57。

⑥ 《后汉书》卷八二下《方术传下·费长房传》,中华书局,1965年,册10/页2743。

形成隔绝,同时追求内部空间与陈设的精美华丽,营造出封闭、精致而缩微的林园格局。宋徽宗对艮岳的观感是:

自山蹊石罅攀涂下平陆,中立而四顾,则岩峡洞穴,亭阁楼观,乔木茂草,或高或下,或远或近,一出一入,一荣一雕,四向周匝。徘徊而仰顾,若在重山大壑,幽谷深岩之底,而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也,又不知郭郭寰会,纷华而填委也。真天造地设,神谋化力,非人所能为者。^①

“若在重山大壑、幽谷深岩之底”,说明艮岳并不是真正的“重山大壑”,而是缩微的山水;“不知京邑空旷坦荡而平夷”,说明艮岳能自成一个新天地,与外界形成隔绝。可见宋代的御苑比起唐代更少皇家气派,但设计却更精巧,更接近于文人园林^②。

二

中唐以后^③,中国文化从整体上有转向内在与精微的趋势。整个社会对于居室、园林的审美标准,由“宏大壮丽”转为“精微工致”。王国维将美分为两种:一为“优美”,一为“宏壮”。“宏壮之美”指的是非人力所能驾驭之美,“如自然中之高山、大川、烈风、雷雨,艺术中伟大之宫室”等等。壮美主要是自然天成的,也可以说壮美是不注重形式的;而“一切优美皆存在于形式之对称、变化与调和”。至于有些寻常琐屑之景物,在一般人眼中,完全够不上宏壮或优美的,一经艺术家之手,使人顿觉有难以言表之趣味

的,王国维称之为“古雅”。“古雅”所追求的完全是形式之美,故王国维说:“古雅者,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。”^④

北宋洛阳的园林,绝大多数是在隋唐名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^⑤。对唐代而言,北宋洛阳园林的规模小了,但更讲求形式,由“宏壮”而入“优美”;比较明清而言,北宋洛阳园林又不像明清文人园林那样“雅致”甚至流于“匠气”;恰好处在一个转型期内。这都可以在《洛阳名园记》中寻得端倪。北宋的洛阳人曾提出:

园圃之胜,不能相兼者六:务宏大者少幽邃,人力胜者乏闲古,多水泉者无眺望。能兼此六者,唯湖园而已。^⑥

园林的有些优点是不可兼得的:如果注重了外观上的宏大壮丽,就难有曲径通幽的深邃之感;人工造作的痕迹明显了,又容易缺乏闲远古淡的意境;能够利用自然水流山泉的,往往又缺少登高远眺的外部视野。而只有原唐代宰相裴度留下的湖园,能够兼备这些优点。这“不能相兼者六”,大体上已概括了宋人心目中理想的“壶中天地”的境界,即力求在园林中更好地调和“人力与自然”、“城市与山林”、“空间与时间”这三对矛盾。

(一) 用人力追仿自然

洛阳的“水北胡氏二园”,位于邙山山麓,漉水流经其旁。造园者依山势,在岸边凿出两个深百馀尺的土穴,将其加固之后,开窗临水。土穴之东,有亭榭花木,从园中俯瞰漉水,壁立峭绝。李格非称赞:“天授地设,不待人力而巧者,洛阳独有此园。”^⑦胡氏二园巧妙利用自然地

① [宋]王明清《挥麈录》,页 58。

② 参周维权《中国古典园林史(第三版)》,清华大学出版社,2008年,页 285、295。

③ 内藤湖南所说的“唐宋”,“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”。只是为了便于讨论,内藤沿用了过去历史家以朝代划分时代的办法(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》,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》,册 1/页 10)。也就是说,“唐宋变革”的发轫期是从中唐后开始的。

④ 王国维《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》,《静庵文集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年,页 162—164。

⑤ [宋]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:“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。”(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四,页 192)

⑥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 200。

⑦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 199。

势,造成“天授地设”之感,这是用人力追仿自然最成功的范例之一。园林的本身,人工斧凿的痕迹并不明显,即所谓“不待人力而巧”,但如果不是人为地刻意选址于邙山之麓、瀍水之滨,便不可能有此效果。

侯迺慧说:唐宋两代都一样看重水在园林中的重要地位,“但是宋代更精巧地发展出以水为中心的园林结构原则。在动态的溪流方面,用人工控引的水道以贯串起每一个重要景区,使流水成为园林游赏的动线。在静态的水池方面,则由沿水岸立山石、造亭榭的向心方式来挽摄各景”^①。北宋洛阳园林,在用水方面,主要是借重伊水与洛水。就《洛阳名园记》而言,至少董氏西园、董氏东园、环溪、苗帅园、文潞公东田、紫金台张氏园、湖园与吕文穆园等,都是以水景见长的。

在丛春园的先春亭上,可北望洛水。洛水上的天津桥,乃叠石而成,洛水直泻桥下石底,激起霜雪般的白浪,水声响彻数十里。李格非曾于穷冬月夜登先春亭,听洛水声,觉得寒侵肌骨,不可久留^②。

丛春园将洛水与天津桥纳入园林的景观,在先春亭上赏月听涛,别有意境。这用明代计成的话说,叫做“借景”:

夫借景,林园之最要者也。如远借,邻借,仰借,俯借,应时而借。然物情所逗,目寄心期,似意在笔先,庶几描写之尽哉。^③

借景,既可以将园外远、近、高、低处的景致纳入园林的视野范围之内,也包括将时令节气与昏旦阴晴等自然天气条件,乃至水浪、松涛等音色效果融入景观,而且特别强调要在特定的角度、特定的时间与气候条件下欣赏或体验。因此借景是要在造园之初就仔细规划设计的,

即计成所说的“物情所逗,目寄心期,似意在笔先,庶几描写之尽”。人们眼里所见的,只是心里想看到的东西。景色虽然是天成的,但哪些是进入园林视野的,哪些又是要突出表现的,实际上早已经过造园者或欣赏者的人为“定序”。

宋代园林以人力追仿自然,还体现在对园林植物的改造方面。北宋洛阳的花匠已能通过嫁接技术,培育出新奇的花树品种:

洛阳良工巧匠,批红判白,接以他木,与造化争妙,故岁岁益奇且广。桃、李、梅、杏、莲、菊,各数千种;牡丹、芍药,至百余种,而又远方异卉,如紫兰、茉莉、琼花、山茶之侔,号为难植,独植之洛阳,辄与其土产无异。故洛阳园圃,花木有至千种者。甘露院东李氏园,人力甚治,而洛中花木无不有。^④

除上述李氏仁丰园以花木知名外,富郑公园的竹子、天王院花园子的牡丹、袁象先园的松岛、大隐庄的早梅,也都在洛阳园林中独具特色。

园林中的水体与植被都特别依赖于人力的维护,一旦产业易主或时代变迁,往往就荒疏走样了。唐代的白居易在履道坊有十亩之园,其中有水一池,有竹千竿。入宋之后,水、竹虽然还在,但园林却已一分为二。一半为张氏所得,改为“会隐园”,一半为“大字寺园”。所以李格非说:“因于天者可久,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”^⑤。这更加证明园林并非纯自然,而是人力追仿自然的产物。

(二) 在城市中遥看山林

董氏西园、东园均为工部侍郎董俨的宅园,西园的亭台花木为历年增修所成,李格非称赞此园:

① 侯迺慧《宋代园林及其生活文化》,三民书局,2010,页518。

②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四,页195。

③ [明]计成著、陈植注释《园冶注释》卷三“借景”,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,1988,页247。

④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197—198。

⑤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199—200。

盖山林之景,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。午路抵池,池南有堂,面高亭,堂虽不宏大,而屈曲甚邃,游者至此,往往相失。岂前世所谓“迷楼”者?^①

厅堂不大,却很幽深。游客到此,仿佛置身迷宫,找不到方向:这是典型的“壶中天地”的格局。园林位于洛阳城中,但“清风忽来,留而不去,幽禽静鸣,各夸得意”,又能得山林之野趣。“居山林者谋入城市,居城市者谋入山林”^②,董氏的园林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困境。

“山林太寂寞,朝阙空喧烦”^③。白居易晚年卜居洛阳,选择了一种介于“大隐”与“小隐”之间的“中隐”的生活方式:

大隐住朝市,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,朝市太嚣喧。不如作中隐,隐在留司官。似出复似处,非忙亦非闲。不劳心与力,又免饥与寒。终岁无公事,随月有俸钱。君若好登临,城南有秋山。君若爱游荡,城东有春园。君若欲一醉,时出赴宾筵。洛中多君子,可以恣欢言。君若欲高卧,但自深掩关。亦无车马客,造次到门前。人生处一世,其道难两全。贱即苦冻馁,贵则多忧患。唯此中隐士,致身吉且安。穷通与丰约,正在四者间。^④

其《洛阳有愚叟》一诗可与《中隐》相发明:

洛阳有愚叟,白黑无分别。浪迹虽似狂,谋身亦不拙。点检盘中饭,非精亦非粝。点检身上衣,无馀亦无阙。天时方得所,不寒复不热。体气正调和,不饥仍不

渴。闲将酒壶出,醉向人家歇。野食或烹鲜,寓眠多拥褐。抱琴荣启乐,荷锄刘伶达。放眼看青山,任头生白发。不知天地内,更得几年活。从此到终身,尽为闲日月。^⑤

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“坐在城市里遥望山林”。而将白居易的“中隐”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的,正是宋代人^⑥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:

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,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乎!^⑦

这说的是“庙堂”和“江湖”的关系。读书人不论身处何处,都要抱有忧患意识,要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。与此相对,苏东坡在《灵壁张氏园亭记》中也有一段话,他的观点是“不必仕,不必不仕”:

古之君子不必仕,不必不仕;必仕则忘其身,必不仕则忘其君。……今张氏之先君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,是故筑室艺园于汴、泗之间,舟车冠盖之冲,凡朝夕之奉,燕游之乐,不求而足,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,则跼步市朝之上;闭门而归隐,则俯仰山林之下,于以养生治性,行义求志,无适而不可。^⑧

君子之人不一定非要做官,也不一定就非不做官,无可无不可,顺其自然最好。苏轼特别

①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四,页 193。

② 李清照《打马图》语,[清]俞正燮《癸巳类稿》卷十五《易安居士事辑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7,册 2/页 545。

③ [唐]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八《郡亭》,《四部丛刊》影宋翻大字本。

④ [唐]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五二《中隐》。

⑤ [唐]白居易《白氏长庆集》卷三〇《洛阳有愚叟》。

⑥ 参王毅《中国园林文化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4,页 127—129。

⑦ [宋]范仲淹《范文正公集》卷七《岳阳楼记》,《四部丛刊》影明翻元刊本。

⑧ [宋]苏轼《苏东坡全集》前集卷三二,中国书店,1986(影 1936 世界书局版),上册/页 394。

赞赏张氏的园林位于汴水、泗水之间,处于交通要冲,不论是做官或隐居,进退皆有从容之余地。

司马光在洛阳的宅园叫“独乐园”,从李格非的记述看,“园卑小,不可与他园班”,显然是洛阳园林中相对窄小的一个。尽管如此,司马光通过撰写《独乐园记》与《独乐园七咏》,使园林的意境得到了深化^①,园主人的个性气质也彰显出来了,所以李格非认为独乐园“所以为人钦慕者,不在于园尔”^②。“独乐”是反用《孟子》中的典故。《孟子》本来是主张“众乐”的,要“与民同乐”“与众同乐”^③。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,所以离开政治中心,来到洛阳的独乐园中专心编修《资治通鉴》。他所谓的“独乐”,是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,退回个人的生活。

从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,到“不必仕,不必不仕”,再到“独乐”,字面上看,好像越来越消极,内里的意思其实是一致的,都是对古人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”的观念的发展^④。

洛阳的赵韩王宅园,是北宋开国宰相赵普的园林。赵普晚年以太师身份告老归家,居于此园,但百日之后便辞世。其子孙又都在京城开封居住,因此赵家在洛阳的园林只得常年闭锁。虽然其中也有高亭大树、花木之渊,平时却只是些看家护院的小厮在其中维护。因此李格非感慨:“盖天之于宴闲,每自吝惜,疑甚于声名爵位。”^⑤上天的赐予是有限的,尤其是安闲享乐的生活,甚至比声名、爵位更加难于获取。和

赵普相比起来,苏轼的“不必仕,不必不仕”与司马光的“独乐”,真是说得聪明了。

(三) 以空间凝聚时间

环溪是王拱辰的宅园,园中水流环绕,从南部的“多景楼”可以向南远眺嵩高、少室、龙门、大谷,一片层峦叠嶂;而从北边的“风月台”北望,则是绵亘十馀里的隋唐宫阙楼台。用李格非的话说:“凡左太冲十年极力而赋者,可一目而尽也。”^⑥左思耗费十年之功,撰写《三都赋》,其中的美景,在多景楼与风月台上,都一览无遗了。这已经不是一般的“聚景”,而是唐诗中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的境界了^⑦。在李格非的笔下,自然景物与人文建筑被赋予了时间的维度,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。

洛阳处天下之中,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,太平年代,四方辐辏;一旦战事兴起,又成为是兵家必争之地。“天下常无事则已,有事则洛阳先受兵”,所以李格非说:

天下之治乱,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;洛阳之盛衰,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。^⑧

盛唐时的公卿贵戚,纷纷在洛阳修建池馆,最多时号称有千馀所。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,大量的宅园“与唐共灭俱亡”。官家的园囿犁为良田,树为桑麻,而前朝的遗老们仍在追想昔日宴集的盛景,凭吊池沼的古迹。这是江山易代的黍离之悲。

① 《独乐园七咏》与《独乐园记》见[宋]司马光《传家集》卷三、卷七一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)。按:北宋洛阳园林普遍重视题名点景,如湖园有“四并堂”(《邵氏闻见后录》,页200),出典于谢灵运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》:“天下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,四者难并。”(《文选》卷三〇,册3/页1432)李格非批评水北胡氏二园“其亭台之名,皆不足载,载之且乱实”(《邵氏闻见后录》,页199),也从反面说明了北宋人对题匾的重视。侯迺慧也说:“在唐代,诗歌受到园林意境的启发与影响很大,园林帮助促成了唐诗创作上的辉煌成就,但诗歌的兴荣还来不及对园林产生启发。宋代园林不仅在造景造境上得到很多诗歌的启发,而且特别选用著名诗句命名,加以题榜于景区之中。”(《宋代园林及其生活文化》,页516。)

②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200。

③ 《孟子注疏》卷二上《梁惠王下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下册/页2673。

④ 《孟子注疏》卷十三上《尽心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下册/页2765。

⑤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197。

⑥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四,页193。

⑦ 李云逸注《王昌龄诗注》卷四《出塞二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,页130。

⑧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201—202。

工部侍郎董俨曾以财雄洛阳。元丰年间(1078—1085),因欠了公帑,其田宅籍没入官。城里的董氏西园与东园渐趋荒芜,但总体规模尚存。元祐年间(1086—1094),西园成为当地士宦的雅集之所。东园大池中的含碧堂,四面飞瀑喷泻池中。洛阳人酒醉后,登含碧堂,听飞泉之声,能以醒酒^①,无疑是寒静荒凉的所在了。天王院花园子中植有数十万株牡丹。花期时,城中士女穿游期间,“过花时则复为丘墟,破垣遗灶相望矣”^②。这是“旧时王谢”沦为寻常百姓的兴衰之感。

绍圣年间(1094—1098),李格非被列为“元祐党人”而遭罢官。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嫁给了宰相赵挺的儿子赵明诚,李清照曾写《上赵相诗》,其中有“何况人间父子情”之句。由于赵挺与李格非政见相左,李清照救父无果,体会到“炙手可热心可寒”^③。北宋末年翻云覆雨般的政坛斗争,使赵、李两家都受到巨大的冲击。李格非死后不久,金兵南下,两京沦陷,北宋灭亡。《洛阳名园记》最后所说的“公卿大夫,方进于朝,放乎一己之私自为,而忘天下之治忽,欲退享此乐,得乎?唐之末路是也”^④,不幸而言中

了。南宋时为《洛阳名园记》写序的张琰由此慨叹李格非昔年撰写此书用心良苦,而绍圣年间朝内当权之人的做法,却令旁观者为之寒心。如果说邵博读《洛阳名园记》所发的是兴亡之叹,那么张琰通过李格非父女的遭际,还品到了世事的难测与世态的炎凉。

繁华盛丽,过尽一时。至于荆棘铜驼,腥膻伊洛。虽宫室苑囿,涤池皆尽。然一废一兴,循天地无尽藏,安得光明盛大,复有如洛阳众贤佐中兴之业乎?^⑤

治世难遇。真正能够理解园林之美的人,既要看到其花团锦簇的一面,也要懂得欣赏它的断壁颓垣,透过繁华的表象,看到人力的渺小与不足恃,看到世事的变迁与万物的无常。

(附记:本文曾于2016年11月26日在“思想史视域下的中国语言与文学研究:第二届台大、北大学术研讨会”上宣读,与会的葛晓音、郑毓瑜、黄启书等学者对文章提出了批评与修改意见,特致谢忱。)

①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四,页193。

②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196。

③ [宋]张琰《洛阳名园记序》,《洛阳名园记、桂海虞衡志》,文学古籍刊行社,1955,页3;《癸巳类稿》卷十五《易安居士事辑》,册2/页538。

④ [宋]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五,页202。

⑤ [宋]邵博《洛阳名园记序》,《洛阳名园记、桂海虞衡志》,页3。